

中國人進世十周年的啟示

吳建民 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副會長

今年12月11日，是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十周年。十年來，中國的變化和進步是巨大的，我國的貨物貿易進出口規模2001年為5098億美元，今年有達望3.5萬億美元。十年間，我國進出口年均增長21.6%。我國對外貿易在2001年位居全球第六，到2010年上升到第二位。2001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為1.15萬億美元，2011年達逾6萬億美元。十年的大變化，大發展，推動我國從世界舞台的邊緣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十年的大變化，出乎我們自己的預料，更出乎國際社會的預料。我於1996年至1998年，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以及瑞士其他國際組織的中國代表、特命全權大使。入世談判是代表團的一項重要工作，代表團專門有一個處和一名副代表負責這方面的工作。我有幸對入世談判的複雜與艱難略有了解。回首往事，以及中國入世以來的變化，可以從中汲取重要啟示。

一、要發展、要進步，必須融入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

記得1996年初，我到日內瓦上任後不久，與時任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魯傑羅先生有一次較長的交談。魯傑羅曾經擔任意大利的商業部長。魯傑羅當時非常希望在他任內期間解決中國入世的問題，他認為中國入世對於世界都極為重要。他對我說：他本人從事經濟工作三十多年，逐漸悟出一個道理，這就是：經濟、科技的發展有一股世界性的潮流，這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你融入了這個潮流，你就會大步前進；如果你脫離了這個潮流，那就會大大落後。

我從魯傑羅講這番話時的眼神中看出他是真誠的。我聽了他這番話思索良久，覺得很有道理。中國曾經是在世界上領先上千年的國家，我們為什麼落後了？因為我們脫離了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這不怪天，不怪地，怪我們自己。蘇聯為什麼垮台了？從本質上也是這個原因。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是客觀存在的，世界各國，各民族，各主要文明都對這股潮流的形成做出了貢獻。當然，不同時期大家的貢獻大小不一樣。我們中國人過去幾百年就沒有多少貢獻，這是很令人慚愧的。這股潮流就像歷史的列車一樣，你登上了這班列車，就奔馳前進。如果你誤了這班車，後果是非常悲慘的。中國過去一百多年所經歷的水深火熱的歲月，所受到的欺凌、壓迫，就是因為我們誤了這班車，脫離了人類文明進步的潮流。我們三十多年大發展、大進步，就是因為我們融入了這股潮流。

二、克服意識形態的羈絆，大膽擁抱、吸收人類文明進步的成果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通過第2758號決議，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及其所屬的一切機構中的合法權利，並將蔣介石的代表驅逐出去。這是聯大做出的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決議。根據聯大的決議，關貿總協定於1972年舉行大會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關貿總協定。周恩來總理敏銳地注意到這一動向，認為是件好事，並責成當時的主管部門進行研究。1972年，中國人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兵荒馬亂，政府機構和研究機構受到嚴重衝擊。有關部門被極左思潮的枷鎖框住了，提出的意見是：參加關貿總協定的國家都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而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不應參加。對於關貿總協定大會的決定可不予置理，等對方找上門時再說。

我在日內瓦工作期間，主管入世談判的同志不無感慨地對我說：中國入關或者入世的一個大好時機被我們自己錯過了。當時很簡單，只需要我們的外長給關貿總協定總幹事去一封信，表示中國願意入關就可以了。

世界上存在着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這是客觀現實。意識形態對國家的行為有影響，先進的意識形態，會推動世界進步。然而，千萬不能僵化。人類歷史的進程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陷入僵化的意識形態時，思想就被禁錮住了，就會停滯不前，甚至會大倒退。中世紀的歐洲是這樣，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也是這樣。文化大革命期間，極左思潮把僵化的意識形態推到了極致，鼓吹什麼「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是十分可笑的。我相信極左思潮的吹鼓手們，他們每天吃的是飯，而不是草。

回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的進程，可以看出，僵化的意識形態不時在干擾我們前進的步伐，所謂姓資姓社之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多少年來就是被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框框束縛住了，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發展。這個框框被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破了，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小平同志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三、要開放、要前進，必須不斷克服封閉、保守的慣性

1986年7月10日，時任中國常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團大使錢家東，致函時任關貿總協定總幹事鄧克爾先生，正式提出了中國政府關於恢復在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嗣後，就開始了艱難的中國入世談判。中國入世談判歷時十五年，是關貿總協定以及世貿組織的歷史上最長的談判。

我們入世談判為什麼那麼長？跟美國人、歐洲人、日本人談固然很艱難，但是最難的不是跟外國人談，而是中國人內部談。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利益，都要千方百計的保護本部門的利益。維護本部門的利益，本來無可非議，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有些部門為了保護本部門的利益，不惜誇大入世之後帶來的危險。他們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的一些產業就會被進口的產品衝垮，造成不知多少人下岗、失業，中國經濟就可能崩潰，中國政府就會垮台。他們當時在講這些話的時候振振有詞，好像是非常愛國的。入世之後，各行各業，包括那些聲稱將垮台的行業，不僅沒有垮台，而且迎來了大發展。為什麼當時有些人要如此危言聳聽？我想，這種思想的出現絕非偶然，這是封閉、保守的慣性的表現。

小平同志說，中國到明成祖的時候還是開放的，但是，在之後之後，中國走上了閉關鎖國的道路。鄭和下西洋就是在明成祖朱棣（1402-1424）在位時。五百多年的封閉形成了很強的慣性，我們對此絕不可低估。這種慣性是相當頑強的，一有機會就會露頭，來干擾中國的改革和開放。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就是克服封閉、保守的慣性的干擾所取得的成果。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在中國的清初，我們曾經面臨一次開放和大發展的機遇，但是我們與這次機遇失之交臂。康熙大帝是一位很有作為的皇帝，1662年即位，1722年去世，在位長達61年。幾乎與康熙大帝同時期的是俄羅斯的彼得大帝，俄國的崛起是從彼得大帝開始的。彼得大帝比康熙執政的時間要短，彼得1682年即位，1725逝世，在位43年。康熙和彼得都認識到西方的科技遠遠超過了當時的中國和俄國。康熙專門請了歐洲耶穌會的教士給他講授西方的哲學、幾何學、天文學、醫學等先進的科學知識。康熙大帝得瘧疾就是耶穌會的教士給他吃奎寧治好的。為平息新疆準噶爾的叛亂，康熙大帝啟用了2000人的洋槍隊。洋槍顯然比冷兵器殺傷力大多了，在平息叛亂中作用巨大。康熙還把當時西方發明的玻璃引進到故宮。比較康熙和彼得的政策發現二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康熙雖然認識到西方所取得的進步，但是他沒有開放。彼得則不然，毅然決然，大膽開放。彼得大帝當時的名言是：「給我二十年，我給你一個嶄新的俄羅斯！」這是何等的氣魄！他化名米哈伊洛夫下土，帶了二百多人去歐洲考察了一年半時間，他甚至還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造船廠車間裡做過工。他的考察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極為深入的。此後，彼得採取了一系列開放的措施，把大量的貴族子弟派到西歐去學習，從歐洲引進先進的理念、資金、技術和人才，幫助俄國發展。康熙與彼得不同的政策，帶來了不同的結果。康熙大帝雖然開創了康乾盛世，但是，他沒有縮小中國與西方在科技領域的巨大差距，埋下了中國衰落的禍根。而彼得大帝則不然，他堅決的開放政策，使俄羅斯從此崛起，進而躋身於世界大國之行列。

為什麼康熙沒有採取開放的政策？有的歷史學家認為，清朝是少數民族執政，領導全中國，他們非常擔心自己執政的基礎不穩，開放會導致自己的政權垮台。顯然，康熙不僅懂小平所講的「發展是硬道理」。國家如何才能長治久安？改革、發展才能帶來長治久安。不改革、不發展，只能是死路一條。

克服長期封閉的慣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封閉、保守也符合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他們為了本集團的利益，不惜誇大外來危險和威脅。因此，中國要進步，要發展，必須不斷克服封閉、保守的慣性所帶來的干擾。只有不斷排除這種干擾，才能不斷改革開放，不斷走向進步和繁榮。

四、中華文明一旦吸收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就會生機盎然、蓬勃發展

中國過去十年的大發展、大變化，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是罕見的。為什麼我們發展得如此之快？變化是如此之大？增長如此之持久？我以為，硬實力的基礎是軟實力，軟實力的基礎是文化。任何大發展都是人去做事的，人的行為是靠觀念支配的，而觀念又是由文化來決定的。從中國的大發展中，你仔細去思索，去研究，就會看到中華文明的偉大威力。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延綿幾千年，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這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了不起的現象。炎黃子孫不論到世界哪個角落，一般都能落地、生根、開花、結果。他們做得都很出色，他們一點也不比其他民族遜色。究其根本原因而言，是中華文明在發揮作用。中華文明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前這種巨大的威力沒有發揮出來，而改革開放之後，卻威力無比？這種現象告訴我們：中華文明封閉起來是會萎縮、凋敝的，但是中華文明一旦吸收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那就會生機盎然、蓬勃發展。

胡錦濤主席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上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

過去三十多年的大發展，是值得我們自豪的。但是，這僅僅是開始，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驕傲自滿，藐視人類文明的先進成果。我們的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根本上說，是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這個復興只有在開放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只有在不斷學習和汲取人類文明先進成果的基礎上才能實現。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必將繼續證明這一點。

公民黨「六逆」被港人唾棄

青鋒

公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犯下逆國家、逆憲制、逆民主、逆民本、逆安定、逆真理的「六逆」，違背香港要繁榮穩定，國家要強盛的規律，不能不引起廣大港人的反感和反對。

近讀清顧炎武《答徐甥公肅書》，其中有評論邪難勝正曰：「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戢，六逆彌臻」，用來對照今日的公民黨，實是該黨的寫照。公民黨就快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

已成激進黨民望包尾

港大民調計劃最近公佈「十大政治團體」排名結果，公民黨得分又比3個月前下跌1.7分，排名更首次連跌兩位至第八位。緊接其後的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包攬末尾，加上今次區選都遭滑鐵盧，可見這三個激進暴力黨被市民唾棄。公民黨因大命忽焉，三風不戢，六逆彌臻，在港人心中已成激進黨、害人黨、叛逆黨，完全是自作孽，咎由自取。

大命者，自然之數即自然規律也。公民黨大命忽焉，是公民黨違背自然規律。香港回歸祖國，是一百五十餘年殖民統治氣數已盡，回歸中國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可是，公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反對香港特區政府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反對防止有人顛覆中國政府和分裂國家領土主權完整，並鼓吹香港「高度自決」實現「港獨」，既違背香港要回歸，國家要強盛的規律，就不能不引起作為中國人的廣大港人的反感和反對。

「六逆」反中亂港終被港人唾棄

公民黨有六逆：逆國家、逆憲制、逆民主、逆民本、逆安定、逆真理，是個大逆不道的政黨，焉能不败！

逆國家。公民黨黨魁梁家傑鼓吹「香港特區在合法政治下分裂的正當性」，要把香港從國家領土的完整中分裂出去；鼓吹「特區政府官員不需中央任命」，反對中央對香港行使主權；煽動港人與國家對抗和對國家的仇恨。其叛逆國家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

神棍訟棍政棍禍港

李民理

說來奇怪——其實也並不奇怪，那就是：本港的反對派與其他地方不同，各式各樣的「棍」類堪稱「非常之多」，包括神棍、訟棍、政棍等。不知道反對派之中還有沒有賭棍、票棍之類。被大眾視之為「棍」，可以肯定算不上是好人。反對派內多這種「棍」、那種「棍」，試問，反對派的品格和作風又「好得去邊」？

先說神棍。最出名的當然是那個「政治主教」。這個神棍最拿手的並非導人向善或勸人皈依天主，而是挑唆別人上街造反。這樣的主教，恐怕全世界都少有。最令人驚訝的是，「黑金」大王捐五千萬萬元給反對派，「政治主教」一人分得二千萬元。這筆錢，有「來龍」，無「去脈」，究竟具體用在哪些方面？有沒有記賬？受益人是誰？似乎除了神棍沒有其他人知道。市民的疑問是：天主知道不知道？

再說訟棍。大橋環評案、外備居港權案，都是訟棍的「傑作」。這兩宗官司在香港引起了眾怒，因為它們極大地損害了廣大市民的利益，單是大橋環評案，因打官司延誤了工程，為追上工程進度，確保如期建成通車，要額外開支至少65億元。65億元！可以建多少公屋，讓輪候人士（15.5萬人）早日上樓？加上外

備案，有可能對本港的公屋、醫療、教育、交通、綜援及其他社會福利造成巨大的衝擊。訟棍的所作所為，十足是「人民公敵」的典型表現。最令人不忿者，竟有訟棍狡辯說：「我哋支持外備的申請權，我哋不支持外備的居港權。」這是什麼屁話？外備要有申請權，他們申請的不就是居港權嗎？許多天真的人不知「訟棍」是甚麼「東東」，看到這樣的狡辯，就可以知訟棍是一些怎樣的角色了。一言蔽之，就是「厚顏無恥」，什麼卑鄙的話都說得出來。

三說政棍。觀察反對派，可以說政棍俯拾即是。政棍的最大特色，就是言行有兩套標準，文雅些說就是「責人嚴、責己寬」，甚至是「只責人、不責己」。可能為數不少的政棍們都以為自己是「天下第一」。嗚呼！市民常常可以在電視新聞或談話節目中看到，反對派的政棍們，如何指罵中央、特區政府及建制派，只見政棍們不論男女，都是咬牙切齒、滿嘴狂言，猶如世仇宿敵，不共戴天。政棍們不妨想一想，有這個必要嗎？

反對派多神棍、訟棍、政棍，說不定某些人還可評為惡棍。如此「棍、棍」聲，外地人看香港反對派，不知有何感想？

解決劏房問題的建議

曾淵滄博士

花園街發生縱火慘劇，多人死傷，事件馬上引發各界討論排檔、唐樓劏房的安全問題。

需求大 劏房難取締

實際上，排檔、唐樓劏房的安全問題已經存在了很長很長的時間，社會各界沒人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但是，只要一天不出事，沒有人有興趣討論；一旦出事，人人都爭着發表意見，討伐政府有關部門監管不嚴。然後政府就會成立一個所謂部門的委員會討論，重提出改善的方法。

但是，不論如何改善，最根本的安全問題是無法改善的。因為政府沒有能力真的根治唐樓劏房的問題，只要唐樓劏房一日存在，安全問題始終無法解決。

為什麼唐樓劏房的問題不可能解決？理由是太多人想居住在市區，市區房屋供應遠遠不足。

以往，香港製造業鼎盛之時，人口可以分散居住，住在非市區的人仍可以在其居住處附近找到工作。但是，今日的香港，經濟活動高度集中於市區，各類服務業包括金融、零售皆集中於市區，居住在非市區者每日得花費大量的時間與金錢到市區工作。因此，不少人情願居住在市區非常狹窄的劏房裡，付出不低的租金，目的就是節省時間。劏房成了一本萬利的事業，業主、二房東也就紛紛將唐樓改為劏房出租。

政府能真正取締劏房嗎？

加快新區建設較為可行

不可能的，因為需求太高。今日市區房屋供應非常非常之缺乏，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條路。第一條路是設法將經濟活動由市區轉移分散至全香港各地，開發郊區成新的經濟活動區；第二條路是加快市區重建。

中國內地開發新經濟區的成績有目共睹，上海浦東的成功經驗可供香港參考。

現在，特區政府已宣布準備開發東九龍成為第二個商業區，這是好事，還有分散經濟活動的功能。除了東九龍外，如果能開發新界北區、新界西北區，那麼，分散經濟活動的功能就會更顯著。新界與深圳接壤，深圳最繁華之處是南部，理由是連接香港。可是，香港最北之處當然是人口極少的禁區。今日個人遊已這麼普及，內地與香港居民之間的來往這麼方便，還保留禁區幹什麼？雖然，新界原居民的地權、開發權比較複雜，這可能是過去港英政府、今日特區政府不雙開發的原因之一；但是，相信有心開發，必有雙贏的方案。

市區重建這條路也不容易。香港保育分子的聲音太大了，任何拆卸舊樓的行動都引起巨大的反對聲音，令人懷疑所謂的保育運動，實際上就是地產霸權在背後支持的活動。因為市區重建速度越慢，市區土地供應越少，樓價就越高，地產霸權得益越大。